

◀ (上接2版)

但不少中国人了解邹至庄却是因为这位华裔经济学家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发展立下的汗马功劳。

一件事情从零开始，多要借助外力，教育更是如此。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美国经济学家来华讲学，邹至庄便在其中。1983年10月20日，邹至庄位于普林斯顿的家里，迎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教育部外事处处长王复孙和负责经济学教育的王泽农。客人离开前，三人敲定了一件事情——1984年夏天，在北京举办经济学培训班，全程采用英文授课，且不设翻译。9个月后，培训班如期在北京大学举行。还是在这个夏天，邹至庄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是会面探讨的主要议题。

一年后，“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简称“福特班”）正式迁至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由邹至庄牵头邀请欧美知名、甚至是最知名的经济学家来华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门课程，学期为一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福特班”项目始于1985年，止于1995年，先后有417名学生参加了培训；1987—1992年的五年间，另有201名学员在复旦大学完成了“福特班”的学习。洪永淼、蔡洪滨、肖志杰、刘振亚、赵耀辉等知名经济学家皆出于此。“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被认为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系统地将现代经济学理论引进高校的开篇之举。从此，现代经济学在国内渐成显学。

作为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邹至庄的《中国经济》问世。其中文版的翻译工作由当时尚在普林斯顿深造的杨小凯、于大海两位学者担

纲，译本于1985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这样一本教材恰是当时中国经济学教育所急需的。

1984年夏，邹至庄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研究生，由他推荐到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就是著名的“邹至庄留学计划”。作选拔之用的试题由邹先生亲设，这就是国人所熟知的另一个“Chow test”。

那个时候，国内少有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报考者多为理工科学生，缺乏对于经济学最基本的认识。于是，那本《中国经济》很快扮演了考前辅导用书的角色。考试结束，教委把名单交给邹至庄，由他来安排这些学生在美国的去向。

要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研究院去读书，即便对于美国学生而言，也并非一件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何况是30年前准备攻读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学生。“这绝不是我个人一封信可以做到的。”邹至庄亲拟了一封推荐信，收信人为北美排名前50的经济系的系主任。这封信言辞恳切，落款尤为用心良苦。“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三个人的签名”——除了邹至庄外，另外两个签名是由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Brian Taylor）和埃德温·米尔斯（Edwin S. Mills）亲笔写下的。事实上，这一切的准备工作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此前，泰勒与米尔斯都曾应邹至庄之邀，来华授课。两位大师对于中国学生渴求系统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认同，便是从那时起在北京埋下的。

这样一封信的分量可想而知。1985—1987三年间，共有165名中国学生经由邹至庄的推荐，步入北美高等学府，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周林、



“福特班”合影，1986年7月摄于中国人民大学。前排左六为邹至庄。



“福特班”三十周年纪念合影，2016年6月摄于中国人民大学。前排左六为邹陈国瑞，左七为邹至庄。

李稻葵、许小年、白聚山、梅建平等人均受益于此。如今，他们大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记者曾目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当着学院师生的面，将深深一鞠躬送给邹至庄先生，情真意切胜于万语千言。

面对后辈奉上的敬意与感恩，邹先生总是回以那句“我只是做了我乐于做的事情”，转而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我遇到了很好的机会，只是没有错过而已。”开始以为这些不过是老先生的谦虚与客套，可是聊久了才发现他是认真的。

后辈学人感激邹先生为自己推开了一扇命运之窗，而他却感恩命运选择了自己的手去推开那一扇扇年轻的希望之窗。这是个体对于生命价值的判断与期许。

作为一名学者，将1000万美元捐赠给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他不纠结；作为一掷千金的“富豪”，他却抱怨iPhone叫价太高，坚持用笔记本电脑收发邮件与外界沟通。不讲课、不出席活动的时候，在他身上常常可以寻见普林斯顿的校徽。讲台上的邹至庄，则总是西装笔挺，儒雅体面。翻出30年前邹先生授课

福特班时的照片——他常常着一件深色西装，持重又笃定；内搭一件高领羊绒衫，内敛而得体。

教师总是依恋讲台的。去年12月，邹至庄在厦门大学停留了两个星期时间，而捐款不过是他此次行程中的一个环节。与研究生座谈、给本科生上课，年轻人眼里，他褪去了大师的光环，只是一个睿智而亲切的大朋友。应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要求，邹先生要给本科生做六次讲座，题目涵盖了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基础和城市经济学几项内容。面对知识储备相对薄弱的本科生，在一个半小时内讲清楚相关题目的所有重点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邹先生而言，因为他无法接受一堂不够完整的授课。“我教了几十年书，电脑里存了很多课件。可是这一次，竟没有一个现成的课件可以拿出来用。”谁能想象这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泰斗，竟为了给本科生上课而在夜里挑灯备课。

我们常常仰望“星空”，期待同样耀眼的人生，却未必晓得从哪里开始发“光”、发“亮”。用邹先生的话来说，“生活原本就需要些努力，这

也恰恰是生活的乐趣所在。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幸运的是，这些事可能对于国家、对于社会也是有些好处的。”

“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比物质资源更为重要。时尚美观的建筑、设备先进的工厂都是由人力资源创造出来的。”作为经济学家，他的行为背后似乎总能找到一个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动因。

经济学本是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家无不梦想着为国计民生贡献力量

有个坐拥万贯家财的“富爸爸”，无疑是人生的第一份运气。如果不是家境殷实，1948年的光景，一个20岁不到的年轻人恐怕难有机会远渡重洋去彼岸求学，更不要说怀着那份自费且不打工的潇洒与淡定走过。“当时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出去就是为了学成之日回来报效祖国，因为前辈们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留学目的



2011年2月，邹至庄教授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同学们一起座谈。